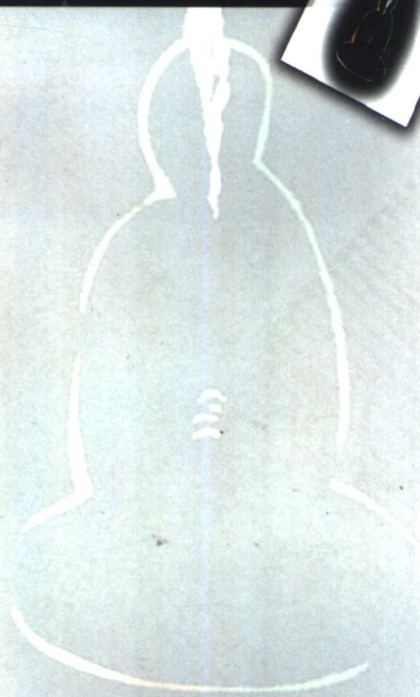


五代作家 的人格 与诗格

张兴武 著



人民文学出版社



五代作家 的人格 与诗格

张兴武 著



人民文学出版社

二〇〇〇年·北京

(京)新登字 002 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五代作家的人格与诗格/张兴武著. -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0.3

(旸谷文丛)

ISBN 7-02-003099-8

I. 五… II. 张… III. ①作家评论-中国-五代(907~960) ②诗歌-文学评论-中国-五代(907~960)
IV. I207.2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1999)第 56526 号

责任编辑:张福海

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100705 北京朝内大街 166 号)

新华出版社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发行

字数 215 千字 开本 850×1168 毫米 1/32 印张 9.75 插页 2

2000 年 3 月北京第 1 版 2000 年 3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印数 1-3000

定价 16.00 元

编辑人语

我们有许多文化泰山可供仰止,我们有许多成熟的学术和学术的成熟。可我们还有一种期盼——期盼一次撞击和一次超越。

因了破壁的期待,多年的面壁才成为甘愿的付出。因了穷经的追逐,继晷的膏油才会被不停歇地点燃。因了共有的执着,“旸谷文丛”才得以实现实力的主题。

也许,尝试会迷失在尘封的历史里;也许,探索会导向一个错误的轨迹。但每一次的尝试或探索都会在文化的苦旅里作出自己的贡献——用失败为后人树立一个正确的坐标。

这套书的作者全是中青年学者,他们不是用名声来向世人证明自己的实力,他们只是用一种努力来不负一次相约——用你我的手,托起一轮明日的学术太阳。

《淮南子·天文训》云:“日出于旸谷。”“旸谷文丛”之名由此而来。

序

五代诗是晚唐诗的延续。五代诗人的人格与诗格，亦承晚唐而来，故历来以五代诗附属于唐诗之后。然而在史学研究中，五代史研究是一种专门之学(二十五史中，五代居其二)；五代文学不作为一个独立的文学阶段进行研究，则与之不称。清时王士禛《五代诗话》、李调元《全五代诗》稍开其绪，为五代诗研究作了资料准备，惜荆榛初辟，后继寥寥。这是中国文学史的整体研究中一个明显的缺陷，在唐代文学与宋代文学之间失落了重要的一环。

在我国历史上，统一始终是历史发展的主流。然而，若干战国形态的分裂时期不时与之交替，为时也并不短暂。三国、南北朝和五代十国，就是在统一遭受破坏之后，陷于全面分裂的。全国统一形势下的局部分裂，则后世从未绝迹。统一或是分裂，不仅对当时的政治经济起着决定性的作用，而且对文学来说，同样命运攸关。文学发展的内部条件和外部条件，在统一时期与分裂时期就各不相同，至少有着重大差异。五代文学，历来被认为是处于前有唐音、后有宋调的两个巅峰之间的一条峡谷。唐代文学的繁荣与宋代文学的复兴，两者都是统一的结果；五代文学的相对停滞，则是分裂的结果：这是无须争辩的事实。当然，说五代文学停滞，只是相对而言，在诗文之外，五代在词曲以及书



画艺术等方面都有重要的发展。不过西蜀词和南唐词毕竟偏于一隅,作为一种分裂的文学果实不免苦涩而且寡味。词曲一门更为远大的发展,还需要入宋后的统一的条件。

文学史需要研究统一时期的文学规律与文学特色,也需要研究分裂时期的文学规律与文学特色,两者互有联系,然而不能彼此替代。在分裂时期出现的,如原有文学重心的漂移,文人命运的普遍恶化,传统文学主题的变异等等,往往是伴随统一转向分裂的一种自然趋向。同时,也不能不看到,在分裂时期的文学中,潜藏着强烈的统一的呼声,并为日后的回归统一作好足够的文学上的准备。西蜀词和南唐词,作为宋词兴盛的前奏,不也是一种无可争辩的事实吗?

1993年秋,兴武同志远自陇上,来杭大攻博,从原治先秦两汉文学,转而以五代诗为其研究专题。自此无论寒暑,常见其埋首书案,手不释卷,旁搜远绍,孜孜不倦。他先从占有详尽的资料入手,通读全唐五代诗,同时广泛搜集相关史料,包括史传、笔记及其他文献,尤其注意近人著述中关于五代诗的研究成果。一年后,编成五代诗事长编。这些前期准备工作,做得踏实认真,一丝不苟。

从1995年初,到1996年春季,《五代作家的人格与诗格》三易其稿,部分章节有五易其稿者。该书对研究现状尚称薄弱的五代诗,作出了开拓性的研究。其中,关于五代诗的时代断限和研究价值、五代时文学重心的南移、作家人格的剧变等问题的探讨,颇具特识。经过多视角考察,然后得出五代诗不仅是由唐诗到宋诗的过渡,而且具有独特的时代风貌和艺术特色的结论,顺理成章。此书现由人民文学出版社接受出版,这是令人高兴的事。我认为,书中的不少论点是人们感兴趣的,或许还将引起学



术界的关注和重视。希望兴武同志以此为新的起点,在学术研究中取得更多的成果。

吴 熊 和

一九九七年八月于杭州大学

目 次

第一章 需要对五代诗进行独立研究	1
第一节 五代诗的研究范围	2
第二节 对五代诗进行独立研究的价值判断	10
第三节 五代诗研究的现状和任务	17
第二章 历史环境的恶化	30
第一节 唐末战乱和文人命运的恶化	30
第二节 五代十国时期南北方文士的不同境遇	37
第三章 文学重心的南移	56
第一节 中原作家的播迁南移	57
第二节 南北方作家人数的悬差	62
第三节 南北方创作实绩的比照	72
第四章 作家人格的剧变	82
第一节 文士与政权关系的疏离	83
第二节 从“守道”到“顺时”的转变	93
第三节 从“功名”到“名利”的不同追求	100
第四节 隐、仕人格的分离与契合	105
第五节 “醉入花间”的人格追求	115
第五章 诗歌主题的取向	128
第一节 战乱和流离	128



第二节	怀古和咏物	133
第三节	乡思和友情	136
第四节	隐逸的旋律	142
第五节	艳情的发挥	146
第六章	诗歌艺术的衰落(上)	
	——个体人格与诗格关系的抽样分析	155
第一节	罗隐:从愤激到流俗的必由之路	155
第二节	李建勋:人生和艺术的统一	165
第三节	徐铉:对分裂和统一的不同体验	171
第七章	诗歌艺术的衰落(下)	
	——群体人格观照下的诗风衰替	181
第一节	衰微的艺术气象	181
第二节	贫浅的内在意蕴	188
第三节	偏狭的审美情趣	197
第四节	体式 and 语言	204
第八章	唐诗与宋诗的桥梁	
	——五代诗主流及其过渡特色	216
第一节	通俗诗风	217
第二节	苦吟诗风	222
第三节	学人之诗	234
附录一	南唐隐逸诗人陈陶考	244
附录二	五代作家综合年表(简表)	253
附录三	征引书目	298

第一章 需要对五代诗 进行独立研究

在我国古代诗歌史上,唐诗与宋诗双峰并峙,各领风骚,其神采风韵流传百世而不衰。五代诗介乎唐诗与宋诗之间,成绩远不如后二者之显著,但由唐诗到宋诗,五代诗实为不可缺少的桥梁。而且,五代诗不但上承晚唐,下启宋初,它本身还是一个独立的具有鲜明时代特色的文学发展阶段。然而,五代诗的这种独特地位,却很少为前人所重视。清乾隆时,李调元辑《全五代诗》,感叹:“五代诗向无全本,编诗者率皆附之唐末宋初之间,并少专辑。”在此之前,宋计有功《唐诗纪事》、元辛文房《唐才子传》,及清人所编《全唐诗》,并附五代诗人于唐末;清厉鹗《宋诗纪事》及近人陆心源《宋诗纪事补遗》,又缀之于宋初。五代史向有专书,有薛居正等的《旧五代史》和欧阳修的《新五代史》,史学界于断代史研究中也列为专史研究。五代诗却没有这种幸运,它们或者上附于唐,或下附于宋,或者干脆抹煞不提。原因大约不出两端。其一认为五代诗多亡国之音,无预风雅。牛运震《五代诗话序》谓:“五代之乱极矣,政纪解散,才士凌夷,干戈纷攘,文艺厥如。如诗歌间有之,亦多比于浮靡噍杀,嗷然亡国之音者皆是也,乌睹所谓风雅者乎!”^[1]其二则认为,五代为时短促,前后不过五十三年,对后世有重大影响的诗人几乎没有,中小名家



也屈指可数。当时诗坛上一些有名的诗人,或由唐末转入五代,如司空图、罗隐、韦庄、郑谷、韩偓、黄滔、徐寅、崔道融、郑良士、王贞白、卢延让、贯休、齐己、杜光庭等;或由五代转入宋初,如张昭、陶穀、李昉、王溥、谭用之、欧阳炯、李涛、徐铉、张洎、殷崇义(后更名汤悦)、林逋、钱惟演等。这些诗人都身处易代之际,前一类可以归属于唐,后一类又可归属于宋。由此,人们对五代诗能否作为一个独立的文学阶段来研究,就难免产生怀疑。然而,虽然有些作家经历朝代更替,但他们主要生活和创作年代非唐非宋,而是五代,这一点不容回避。至于说五代诗都是“亡国之音”,“乌睹风雅”,恰好表明五代诗的研究十分贫乏,正有待于进一步开展。

在对本专题进行探讨之前,首先须明确“五代诗”的文学涵义,同时讨论“五代诗”的研究价值,划定五代诗的上限与下限,并对前人的研究成果作出评价。本书的讨论也就从这些问题开始。

第一节 五代诗的研究范围

按照通常的理解,五代诗即五代时期的诗歌,也就是从朱温篡唐(907)至北宋建国(960)的五十三年间所产生的诗歌。但是,从文学史的实际情况考察,五代时期凡是较为有名的作家,其生卒年几乎没有多少是限定在这个时间框子之内的,不是生于其前,就是卒于其后。同时,“五代诗”作为乱世文学的特色,也不是从公元907年以后才形成的。为了从这一困惑中解脱出来,前人已作过许多探索。《五代诗话》和《全五代诗》两书,便是最早将“五代诗”的时代涵义和“五代”这一历史阶段作出相应区



别,并对五代诗的上、下限作出划断的。

一、《五代诗话》及《全五代诗》的时间断限及其得失

《五代诗话》一书原是王士禛于康熙年间历时十馀年,手辑而成,初稿两册十二卷。乾隆十三年(1748),其门人黄淑琳、宋弼、郑方坤等重新校订,刊为十卷。十二卷本原有六百四十二条,郑方坤等删去二百一十六条,增入七百八十九条,共存一千二百一十五条。删补之后的《五代诗话》,是一部“采摭繁富”,“五代轶闻琐事几于搜括无馀”^[2]的资料汇编。其后,李调元鉴于《五代诗话》“所载者事迹,诗或缺焉”的不足,于乾隆四十三年(1778)编成《全五代诗》九十卷。《五代诗话》和《全五代诗》首先将五代诗作为一个独立的搜讨与研究对象,为五代诗人及其作品的专门研究提供了较为完备的资料。

从《五代诗话》所收的诗人来看,王士禛、郑方坤等人将五代诗的上限定在唐昭宗一代的诗人,司空图被看作是五代第一个名家。有些作家死于唐亡之前,也被收进了《五代诗话》。这种作法不久便招致非议。《四库提要》评《五代诗话》云:“原本方干、郑谷、唐求诸人,上连唐代,方坤既已刊削,而司空图之不受梁官,韩偓之未食闽禄,例以陶潜称晋。仍是唐人,列之五代,亦乖断限。”这一责难,就是对“五代诗”的断限持有异议所致。按照王士禛和郑方坤的见解,凡是唐昭宗时在世的诗人,都应列入五代诗的范围。如杜荀鹤、王贞白、李山甫、张乔、任涛等。杜荀鹤卒于昭宗天祐元年(904)(参岑仲勉《郎官石柱题名新考订·补僖、昭、哀三朝翰林学士记》考);王贞白于天复元年(901)弃官归隐,卒年无考;李山甫虽广明以后犹在世(《唐诗纪事》卷七〇),但未见其在五代之记载;张乔及任涛二人,都名列“咸通十



哲”^[3]。昭宗时上述五位诗人仍都在世。《四库提要》视为“有乖断限”的司空图和韩偓，其卒年均入梁以后。《旧唐书·文苑传》谓司空图“唐祚亡之明年，闻辉王遇弑于阴济，不恻而疾，数日卒，时年七十二”。韩偓卒年更为靠后，据王达津先生《唐诗丛考·〈官柳〉诗和韩偓的生卒年》一文考证，韩偓“卒年可能在后梁乾化四年(914)或乾化五年(915)”。

《全五代诗》的断限，基本上与《五代诗话》相一致。李调元所录唐末诗人，除杜荀鹤、张乔已见于《诗话》外，还有钱珣、温宪、曹松、王希羽、刘象、王毂等。钱珣在昭宗龙纪元年前后任太学博士，累迁膳部郎中、知制诰，进中书舍人^[4]，未见其入梁之记载。温宪，《唐摭言》卷一〇列于“咸通十哲”之一。据《唐才子传》卷九载，温宪“龙纪元年李瀚榜进士及第”，卒年无考。曹松、王希羽、刘象，并为天复元年“五老榜”^[5]中的人物，登第时皆年逾七旬。王毂，乾宁五年进士及第，《唐诗纪事》卷七〇称“唐末为尚书郎中，致仕”。由此看来，李调元也是把五代诗的上限断在昭宗一代的诗人的。

《五代诗话》和《全五代诗》问世以来，除《四库提要》外，对五代诗的上限一事再没有引起争议。1989年，傅璇琮先生为美籍华裔教授李珍华点校的《五代诗话》作序时，这一问题被重新提出来讨论。傅璇琮先生认为：

他(指郑方坤)对于五代诗的断限，并不拘限于朝代的更替，把其上限断至昭宗朝一代的诗人，这是有见识的。我认为我们若作五代文学系年，似可以从唐僖宗光启元年(885)开始，那时黄巢起义刚平复，但各地节镇却乘机拥兵自立，中央朝廷名存实亡，割据之势已成。而这时如皮日休、陆龟蒙等与晚唐前期有联系的作家都已去世；余下如韦



庄、韩偓、吴融、郑谷、黄滔、杜荀鹤等，莫不由唐入五代，他们的诗风也主要对五代宋初有影响。

不仅肯定《五代诗话》以昭宗一代为五代诗的上限，且进一步指出光启元年应为五代文学系年的起点。理由有二，一为“割据之势已成”的历史参照，二为从唐末五代到宋初的诗风流变，是以昭宗一代的诗人为标识的。这个论断对五代诗研究具有重要的意义。

本文赞同将五代诗上限断在唐昭宗一代的观点，并补充申述两点理由。其一，新、旧《五代史》及路振《九国志》等历史著作记载五代史实，均不始于朱温篡唐之公元907年。新、旧《五代史》的记事，僖宗朝较为简略，详述史实都从光启元年开始。这可以助成傅璇琮先生关于五代文学系年应以光启元年为起点的说法。《九国志》所载南方九国建国之年代，吴为景福元年，前蜀为大顺二年，闽为景福二年，楚为乾宁三年，就都在昭宗朝。宋无名氏《五国故事》及吴任臣《十国春秋》等书，在记述五代十国历史的起始年代上，与新、旧《五代史》基本相同，凡详述年代即从光启元年开始。五代史研究尚不能拘限于五代的王朝终始，何况仅以王朝终始为参照系的五代文学？其二，五代诗人中，有许多在唐末已很有名望，如韦庄、罗隐、黄滔、韩偓等，他们经历了唐朝的存亡，但他们的诗歌创作还是前后相承，并不因此而可以截然分开。就作家群体人格的剧变，和乱世诗歌总体特色的形成这两点而言，唐末五代可以视为一个不可分割的时间整体，尤其是唐末的最后十几年更为重要。司空图、罗隐、韦庄、杜荀鹤等人的诗歌创作主要是在唐末，但他们经历了中央皇权解体的种种灾难，人格、诗格都由此产生重大变化，他们无疑是由晚唐诗转入五代诗的最有资格的传承者，他们举着诗坛的接力棒，



由晚唐进入五代。

五代诗的下限如何断定，也是一个悬案。习惯上以北宋建国为断限，但完全以王朝兴废作为文学时代的划分标准，带来一系列的问题，本文拟兼顾历史和文学两个方面的因素，就此略作申述。

公元 960 年赵匡胤代周自立，并不是五代割据历史的结束，与赵宋政权并峙而立的南唐、后蜀、吴越、荆南、南汉、北汉等割据政权依然存在，占据着从北到南的大片大片的国土。北宋统一全国的战争，前后持续了近二十年，直到宋太宗太平兴国四年（979），最后一个割据政权北汉被攻灭，赵宋王朝始告统一（还有辽和西夏强邻压境，远不是完整意义上的统一）。朱熹《资治通鉴纲目》以开宝八年作为北宋正统之始。其凡例曰：“凡天下混一为正统，正统者，大书纪年继世，虽土地分裂，犹大书之。其非一统，则分注细书之，虽一统而君非正系，或女主亦分注书之。”（《正统例》）其大书纪年就是从开宝八年开始的。明人周礼在《续资治通鉴纲目》卷二开宝八年条下发明朱熹本言曰：

宋建隆初曷为分注其年号，而此大书何？天下未一，宋亦列国耳，故细书之。今此大书者，按凡例，宋得天下颇类唐，故开宝八年大书如武德七年。

撇开朱熹所说正统思想不论，单就其不以建隆元年（960）为新的统一时代的开始这一点而言，无疑是有见地的。赵匡胤即位时，“天下未一，宋亦列国”。公元 975 年江南平，公元 978 年吴越国王钱俶纳土，公元 979 年北汉亡。至此，北宋政权才结束了五代割据的局面，由一个地方政权进而跃升为全国政权。

但是五代史的结束，并不因此就给五代诗打上休止符。文

学史演变不是与朝代的更替同步的。《五代诗话》收录了许多由五代入宋的诗人，如王溥、张昭、李昉、陶穀、范质、张洎、徐铉、郑文宝、欧阳炯、孙光宪、钱惟演等。和此前许多由唐转入五代的诗人一样，上列作家的生平创作也是跨越于朝代更替的。《四库提要》指责《五代诗话》说：“至潘慎修献宋太宗诗，刘兼长春节诗，宋事宋人，一并阑入，尤泛滥矣。”这与前文所举“有乖断限”的议论一样，都忽略了文学自身发展的一贯性和阶段整体性。方回《桐江续集》卷三二《送罗寿可诗序》云：“宋划五代旧习，诗有白体、昆体、晚唐体。”杨亿《杨文公谈苑》“雍熙以来文士诗”条亦云：

自雍熙初归朝，迄今三十年（按指公元984年至宋真宗大中祥符时期），所闻文士多矣，其能诗者甚鲜。如侍读兵部，夙擅其名，而徐铉、梁周翰、黄夷简、范杲皆前辈。郑文宝、薛映、王禹偁、吴淑、刘师道、李宗谔、李建中、李维、姚铉、陈尧佐，悉当时齐流。后来之著声者，如路振、钱熙、丁谓、钱易、梅询、李拱、苏为、朱严、陈越、王曾、李堪、陈诒、吕夷简、宋绶、邵焕、晏殊、江任、焦宗古。布衣有钱塘林逋、缙云周启明。钱氏诸子有封守惟济、供奉官昭度。乡曲有今南郑殿丞兄故黎州家君，及高安簿觉宗人字牧之子。并有佳句，可以摘举，而钱惟演、刘筠特工于诗，其警策殆不可遽数。

这里列举的作家，有些人的事迹已无可稽考，但其中如徐铉、郑文宝、钱惟演等著名人物均系由五代入宋者。杨亿和方回论述五代宋初诗歌的流变，着眼点就是这个时期诗歌发展的一贯性与整体性。后人研究五代宋初诗，也大多继承了这种观点。《五



代诗话》、《全五代诗》及《宋诗纪事》诸书，或收宋初诗人于五代之末，或缀五代诗人于北宋之初，在思路与作法上，与方回、杨亿并无二致。这不仅因为这些作家的创作生涯是跨越时代的，更是由于文学流变的自然规律是前后传承不可割裂的。

五代诗的下限断在何时为宜，这是一个有待讨论的问题。本文认为五代诗的下限可以迟至宋真宗时期。在真宗时期五代入宋及“划五代旧习”的代表作家如李昉、徐铉、九僧等都已故去，而创立宋诗新格局的诗人如欧阳修、苏舜钦、梅尧臣、苏洵等，大多才十几岁，正才华初露头角峥嵘，日益显示出新一代诗人的面貌。因此，宋真宗时期，从文学上来说，完全是个新旧交替的时期。北宋诗文革新运动的任务，是反对唐末五代直至宋初相沿成习的弊端，而这一运动是以欧阳修为旗手的，他是新一代诗歌的领袖。到了欧阳修，唐末五代相沿成习的诗歌风气才告结束。当然，与此同时，和欧阳修一起开创宋诗局面的，还有他所称誉和推重的苏舜钦与梅尧臣。苏、梅二人当时的名望不如欧阳修高，但他们对宋诗的贡献并不在欧阳修之下，后人对梅尧臣的评价或许还在欧阳修之上。宋初盛行白体、昆体、晚唐体，其源都来自唐末五代；宋初诗坛的这种风气，实际上就是五代诗风的延续。从诗歌源流上讲，它们是唐末五代的馀波，而不是宋诗开局的新变。北宋政权虽然建立了，但五代诗风在相当程度上依然继续着，真正的宋诗的时代未免姗姗来迟。

基于上述理由，五代诗的下限就应推迟到宋真宗时期。不过，本文的研究对象，重点仍然论唐末五代作家人格与诗格的演变，由五代入宋的诗人，仅在考察从唐末到宋初的诗风变化时才予涉及。这是为了避免过滥过泛之嫌。妥当与否，尚祈方家有以指教。